

※俄蘇東方學系列之阿列克謝耶夫專輯：「新」中國批判※

## 十月革命映照了中文和 中國文學的演變與革命

阿列克謝耶夫\*著 陳相因、王上豪\*\*譯

### 編輯前言\*\*\*

這篇標題令人悚然一驚的短文，是專為十月革命十五週年舉辦的紀念會議所作。若信以為真而直接讀畢，會忽略當中的言外之意。文章完成於一九三二年，而在此前一年，阿列克謝耶夫已經完成了許多口述與日記體的札記：「直至一九三一年以前，我把研究活動視為像是給予自己一個接著一個的任務。如今卻需要在那些不尊重我的、像是驚鈍又不成熟的人審查之下來選擇任務……」為了表達自己對於這種來自於不尊重他人，卻又擔任發號施令的指導人員們的指示性任務的態度，阿列克謝耶夫必須隨機應變、見機行事：該如何在承認甚至支持他們指示的同時，還能表達自己對學術真理——自己始終不變的信仰——的見解。他在起草於一九三七年，完成於一九四七年，卻到一九八二年才得見天日的長篇論文〈蘇聯漢學〉(Советская синология)中援引正出版的文章，為其水準較差一事辯白，如他在附註中所言，其目的在於避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不必回到如一九三二年般被強迫

---

本文原登載於 *Труды ноябрьской юбилейной сесс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Л., 1933。亦可參照 ед. хр. 229 (Библиогр. 1 ност. изд.)。

\* 阿列克謝耶夫 (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俄羅斯與前蘇聯漢學家、哲學家與翻譯家，全蘇聯科學院研究員、院士。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王上豪，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生。

\*\*\* 本文編輯為班科夫斯卡雅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1927-2009)，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責任主編為李福清 (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俄羅斯與前蘇聯漢學家、全俄羅斯聯邦科學院研究員、院士。

或要求報告；現在在一個開展與深刻的計畫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一個基本的想法：「中國文化綜合體將其多樣歷史與生活階段銘刻並體現於其文字之內，且擁有如此獨特之物，其中的特色即使再微小，也都要有初步及整體的瞭解，最後只能透過科學方法來完成（源自實際生活特點的經驗主義，有朝向專業知識淺薄、涉獵貧乏且一知半解的趨勢）……。」在同篇文章內可見：「從所有中國文化的表現形式中，最讓我們感興趣的首推中國文學，這無疑是該民族最鮮明且最重要的精神指標。」<sup>1</sup> 阿列克謝耶夫將此目標延伸至評論中國當代文學之上：「就最低限度而言，新中國並不比舊中國容易，且要真正地瞭解它，唯有具備充分的中國文化的歷史知識……。」<sup>2</sup> 艾德林 (Л. З. Эйдин, 1909-1985) 在替阿列克謝耶夫《東方學》(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寫後序時，摘錄這段引文來補充說明：「這一主張的確也適用於當今最新的情況，只有遵循它方能徹底了解我們這個時代下一連串的中國社會事件。」<sup>3</sup> 一九八二年的話迄今仍合乎現實——這些都是「迫切尋求真理」之漢學學者的想法，而非「先驗論斷下倉卒總結的基礎」。

\* \* \*

一個良好的組織機構具備健全的基礎與先決條件，能夠創造出計畫性演變的可能性與為學術真理徹底而戰的鬥士，而只有在這個良好組織機構之內，才能夠全盤瞭解所有學問的基礎知識，乃至於整個學科。「中國語言」整體的（常是紊亂的）概念，在學術使用中不可被評為一種怪誕現象，卻可以有權利將這個使用帶入下列方程式（儘管這並非恆等式）：中國語言等於是中國文化的展現。若依此來看，要認識這個錯綜複雜的整體，則需要比其他任一且早已堅固地組織起來的學科知識更為複雜的先決條件來瞭解它。的確，研究中國文化綜合體的人應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理論家、考古學家及藝術家。總之，是個多方涉獵且準備周全之人。顯然地，每個漢學家，只要不是個沒有目標的業餘人士，首先都是社會和個人條件下的成熟產物，而這些條件決定了其特殊興趣和理解程度。因此，我們

<sup>1</sup>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2, с. 120, 138.

<sup>2</sup> 同前註，頁 132。

<sup>3</sup> 同前註，頁 449-450。

處境的特別困難之處，在於對這些來自中國文化綜合體的所有學科認識不深，在首要敵人面前，我們不由得心生恐懼，同時對這個綜合體望之卻步。究竟，何處能尋得這樣的中國文本（當然，要那些值得學術關注的），且在經過西方研究，甚至僅在翻譯後就能讓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或者其他從不同領域的對中國並不認識的人（況且還要不淺薄且非百科全書式地）取得瞭解呢？這樣的文本並不存在。或者，以閱讀《本草綱目》（歐洲作家稱之為 *Materia Medica*）為例，極難透過僅是機械的方式來領略其語言：其成分除了學術術語（其術語也與歐洲大相逕庭）外，到處都綻放出文學優美華麗的光芒。這意味著，需要不斷地在文學與構成這一領域的所有複雜的東西做題外闡述來說明。

如此一來，我們除深度外，還須在廣度上下足功夫，還時常要和時間與空間賽跑，這讓我們常常遇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瓶頸。總之，要成為漢學家，就必須具備豐富的學識與充足的條件。

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相當複雜的情況會阻礙漢學家的求學之路，就算具備受人肯定的才能，亦是如此。這個阻礙就是中國的政治現況，其複雜詭譎眾所周知，在此無須贅述。如此一來，要成為漢學家，還必須鑽研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才能夠瞭解其完整樣貌與細微局部，並明白是什麼在引導著文明中國的命運。不過，在這條路上，漢學家歷經千辛萬苦才得出的概念和評論，其意義可能還會因自然規律而失去意義：原先普通的面容變得慘白而模糊，而應該清晰的卻突然又變得神祕，如此云云。

漢學的所有歷史，實質上就是為了釐清複雜困難的，且為了理解全部的與概括的正被命名的中國文化綜合體。當然，歐洲書面語大多為拼音系統，而非建立在象形文字的基礎上，所以在理解缺乏明確系統的中國書面語時會相當吃力。首批歐洲漢學家的首要任務是試圖將困難度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將自己所知組織起來並持續對這個綜合體中開放實務活動的經驗。由此一來，對廣袤無垠的綜合體消極地初步認識的恐懼，卻轉換成具侵略性的歐洲主義——把中國文化綜合體內所有一切，打上歸自己所有的印記，並貼上自己特有的標籤。可想而知，以這種途徑來看待中國文化綜合體，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而僅（只）以歐洲的方法樣式來為中國概念重新刻板蓋上印記。現代的漢學要與這些歐洲印記對抗搏鬥，揪出中國文化綜合體在時空之外虛構假想的穩定不變性。

一個最廣泛流傳的戳記，乃是「停滯不動的中國」（這可多虧了不成熟及拙劣

的漢學探索與定義)，中國違背萬物法則，不屬演變之列。這是一個虛構假象。且這個虛構假象深深地影響了研究中國的人，使之不急於記錄以自己為出發的觀點，而是開導大眾無須擔心那獨特卻死氣沉沉的「東方之光」。所有的事物都掛上「中國人」與「中國式」的旗幟來研究，這些在非專業的文獻中被強化了，且如眾所周知，總是以中國風 (chinoiserie) 的樣貌出現。所有內行的漢學家當然得認可，中國這個文化綜合體迄今到不久的將來仍舊持續演變，而且更多的是得招認而非懺悔，幾乎我們所有人在本質上渴望出發點具有穩定不變性，因為在電光火石般的現實中，要掌握所有基礎且重要的事物，是相當困難的。

儘管如此，不得不認可，也不能不認清，反映在中國文學與中國書面語言中的中國文化進程仍在演變。當然地，我們也不能同意〔下面〕這種看法——以為這演變目前看似、或許曾是比起歐洲的文化進程演變遠遠慢得天差地別（如果僅能將歐洲文化進程聯合成為一體的話）。中國沒有那種歐洲相互形成又相互摧毀的破壞性遽／劇變：歐洲為一文化湍流，集散著所有歷史；忽而在寬闊原野中爭鳴，忽又幾近殆盡，所有一切皆被日新月異的潮流取代。想當然耳地要舉例而言，假設有一國的前四世紀哲學詩人，像二十世紀的作家一樣地活著與被瞭解著（此處僅談論受傳統教育的人士），而被其他國家的居民或者不同文化（對於這些文化而言，古典主義全部是以另一種語言寫成的）的代表，以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來瞭解，比起這些不同文化的國家之間正進行著相互理解的方式更不一樣。恰巧正在此時，一個足以在人為的社會制度上，不論是個別單獨地或是全部一起地，與自己相互對立對抗的中國出現了。於是理解，所謂的緩慢，更確切地說，在歐洲人看來，具有一種持續的單一性與一貫性。一般似乎咸認為對於這種進程全然不必操之過急；有人說，正當我們即將以自己的意識更加掌握中國文化的核心之際，它都還不會特別地向前挪移半步。這種緩慢的速度出自於〔上述這些〕不符實際且虛構的律令，而促使歐洲漢學落入了萬劫不復之地。更不用談俄羅斯，漢學家〔在數量上〕特別地稀少，這與文化上的對立對抗沒有關連，而這種對立對抗畢竟是產生了某些動機去做學術探索，即便總體來看，這種探索是微乎其微且僅是初學者所特有的。

正因如此，漢學的演變詭譎地停留在文選方面去鞏固自己永遠的基礎知識，所有紀錄的一切乃為教學使用 (adusum scholarum)，卻不做進一步的加工處理，而忽

略了所有串連原有真正中國文化（有一部分為文學）演變的連枷<sup>4</sup>，而當中最為首要者，乃是歷史的連枷。

的確，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東方學學者）依據自身的經驗，皆曉得不僅中國歷史沒有被歐洲學者研究過，也沒有被併入世界史中同等看待，甚至完全（如果不算零星的作品）沒有翻譯成任一語言。此外，甚至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文學作品，也都沒有完整地翻譯至任一歐洲語言或亞洲語言（當然不算具有符號文字的日語）。中國藝術史仍全盤掌握在一些有名望的藝術家手中，可是卻因為不懂語言而無法注意到中國藝術的本質，等等云云。

這樣一來，就算歐洲漢學持續發展，在各方面仍跟不上中國的情勢變化，在論及中國革命的情況時，亦是如此。確實，歐洲的外交官、貿易商、傳教士及其他所有活動家，這些任何研究或甚至公開參與中國現勢的人，猶如一個軍隊，不僅沒有忽視中國的革命運動，相反地還提供充分的情報給自己的國家與媒體（如果不把義和拳事件算在內）。不過，所有學術上的統計，從一九一一年迄今，也就是從中國文化綜合體的改變開始（這當然反映在語言和文學裏）到如前所述的發生實踐，實在是過於倉促，也因此，這些統計成果在整體上被緩慢地呈現出來，於是〔令人懷疑〕這樣的統計究竟是否真實？中國革命極其激烈、無可轉圜地終結了中國傳統帝制和科舉制，研究傳統文化的中國學者從新式教育中脫穎而出，得以躋身漢學名家之列。顯然，許多歐洲漢學家並未完全認清這個事實。當然，一些重要的漢學家，如伯希和（П. Пеллио, 1878-1945）、高本漢（Б. Карлгрен, 1889-1978）等人早就瞭解到這點，他們所有的研究著作早就脫離陳腔濫調的階段（尤其是科普類書籍），對他們研究感興趣的中國人，當中不少是閱讀歐洲的中國讀者和研究中國的中國作家。但主要來說，歐洲作家在書寫中國時，還是緊扣著中國文化無可避免的「根源」並下定論，好似害怕放棄這個迷人但正消逝的共同體，害怕放棄「中國人的中國」（Китайский Китай, China of the Chinese）<sup>5</sup> 這塊基石與體系。歐洲人似乎認為，儘管發生了革命，中國人的生活仍與往常一樣<sup>6</sup>；實際上，歐美文化破壞了這個古老的

<sup>4</sup> 譯者註：一種農具。

<sup>5</sup> 譯者註：英國著名漢學家倭訥（E. T. C. Werner, 1864-1954）於 1919 年寫成的作品。

<sup>6</sup> 因此，甚至現代的中國外交官，受到新中國一群人庇護而得到這個職位的人，在 1923 年於倫敦發表有關現代中國生活原則的演說後，也認為這些原則仍是儒學思想。而我反駁他們的意見卻不曾被他們接受過。

文明，也破壞了從前可輕易採擷的知識綠洲。

現在進行研究比從前更加艱難，現存能夠體現與說明中國文化的事物愈來愈少，屆時我們要研究舊中國，就如同要研究古希臘羅馬文明一樣，只能仰賴典籍和考古了。現今完全被歐美潮流同化與宰制，而建立起來的中國文化，似乎失去了自身的純正天性。因此，在這塊再熟悉不過的土地上發生的革命，對中國來說，是嶄新的經驗，但在歐洲人看來，卻沒有特別研究的必要。當時因為革命而發生了一個有趣的事情，中國想要結合「純」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以建立某種新的典型文化，但歐洲人對這也完全沒有興趣。今日中國漢學已分出一些研究派別，力求開拓自己的道路，不受複雜且混亂的現實影響，不過歐洲漢學家現已準備好加緊腳步，跟上中國的漢學發展了<sup>7</sup>。一些冷靜的改革家發出呼籲（當中主要的學者代表是梁啟超和胡適），讓社會體察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快要消逝，變成模糊不明的文化混血兒，或者如同他們形容的「藍眼睛的中國人」——這些呼籲，似乎特別能夠催眠熱愛中國文化的親中漢學家；當他們從這些活動家〔梁啟超與胡適〕所推廣的芻議中看到的基本知識，仍遠遠超越任何歐洲漢學家的博學多聞。但事實就是事實，違背事實的芻議總是起不了作用的。在中國無人相信這等基本知識，不管什麼樣的新生活，在中國都未曾開始過，漢學家應當「善與惡同等視之」<sup>8</sup>，研究它〔新生活〕，而非天啓般地下預言。

如此一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在歐洲的政治思維裏算是時機成熟了，在學術思維上正準備就緒，而在資訊上卻不那麼地像中國式的革命。我前面已提及，俄國的漢學演變比起西方更為奇特，而且明顯地背離歷史順序的現實。所有人研究什麼，誰就跟著投入，但並不協調一致，亦不在科學與政治讀者的需求之內。不必訝異，除了一些搬不上檯面的報紙消息外，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並未受到我國重視，甚至是一九一二年隨著中國革命腳步前進的我國科學院密使（我也是其中之一），都只是蒐集那些早已擺滿我國博物館的民俗學材料。革命報刊（我還是適度地帶回了一些）、宣傳畫及滿街頭的政治活動，對我們來說，全是唾手可得的獵物，因而不值得探究。此外，街頭運動使學院派的漢學家目瞪口呆，打破所有他們習慣的常

<sup>7</sup> 這裏講的當然不是所有的中國漢學家，而是指到目前仍為漢學大家的學者（羅振玉、王國維及各北京學派等等）。

<sup>8</sup> 譯者註：原文為 *добро и злу внимая равнодушно*，出自普希金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1825）。

軌；而爲了建立新的研究方向，可能得在革命時期的中國住上一年，而非一個月（順帶一提，我到現在也做不到這一點）。誠然，哈爾濱的雜誌對中國革命的關注更甚於我們這些身在彼得堡的學者（基本上在莫斯科是沒有漢學家的），不過他們對基本中國文化的瞭解總是低於一般水平，這也是爲何其學術雜誌未必能名符其實，上面刊載的消息也較不可信。

總體而言，中國革命的頭幾年因歐戰而複雜化，在俄國僅是馬馬虎虎地〔將這種情況〕反映出來。隨著十月革命的推進後，情勢才開始有所轉變，隨著這種〔革命的〕次序，〔我們俄國〕當然地自是不想也不能滿足〔於先前的草率〕。這項鉅變首先濫觴於對「漢學家」一詞的重新定義。的確，如果我們之前對這個詞彙的理解是指精通中國文化並具有高深中文造詣的學者，那麼如今就要撇開這些過時的界定。年輕學者特別從入門起就擺脫沉重舊中國的包袱，符合中國革命青年該有的氣質，不再從傳統當中尋找革命的真理，而投奔嶄新與自由。正因如此，俄國漢學家的人數成長至前所未見的數量。若在從前，俄國境內研究中國的專家能舉出的不超過五位（加上哈爾濱的約有八到十位），而如今人數已不再是十位，而是多達數十位。例如，看看近期俄國出版的中國相關書目，便能證實這點<sup>9</sup>。可以算出，單就一九二七年這一年，我國出版的中國相關書籍不會少於前一個世紀的總量（尤其若不算從歐洲語言翻譯過來的作品）。中國從一個遙遠奇異的國度，變爲如故鄉一般的國家，其現勢離我們如此近。被稱爲「黃禍」的異國疏離感、聲名狼藉與缺乏差異的多數認定（「中國人都說」、「中國人都想」等）皆已消除。原本完全沒有漢學家的莫斯科，將爲許多積極的研究專家成立研究中心。研究室內充滿新面孔，他們不僅預備將來前往中國工作，更要在當地活動及實際居住。

我國科學院在缺乏漢學家二十九年後<sup>10</sup>，終於有一個人能夠揮別先前僵化的學者，擺脫有關舊中國文化的萬年資料，而隨時都致力於研究中國現勢，並開始在大學講授中國的行爲倫理。

顯然，這一整套制度完全誕生於革命的條件之下，但其本身也建立了一系列特殊的條件，像是學者的養成，當中同樣包括許多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和活動者，這

<sup>9</sup> 這裏指的是第一版《中國書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請參閱：Скачков П. 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книг и журнальных статей о Кита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730-1930. М.–Л., 1932; 2-е изд., доп. М., 1960*。

<sup>10</sup> 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院士於1900年去世，阿列克謝耶夫於1929年當上院士。

些人來自四面八方，都集中在莫斯科。舉例來說，如一位列寧格勒的漢學家就算從未離開過莫斯科，也能通曉多達六十種的方言<sup>11</sup>。大致來說，「漢學家」一詞不能局限於通曉中文和中國文化者，這方面的人才不再只有初等教育的畢業生，而是具有專業技能的專家（如醫生、工程師、數學家、建築師等），他們希望能把中國相對應的事物引進自己的泛歐洲計畫（*общеευропейские программы*），不過現在已不須依賴外來字與翻譯，而能更獨立地進行這項作業。

顯然，十月革命為我們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也帶動了新的研究方法，沒有這些新方法，當然就無法著手研究中國的革命進程。大家都熟悉這些研究方法，因這與其他專業的研究方法並無不同。他們首先脫離了中歐的教學與研究系統，首要任務是加強研究中國現勢，不浪費時間去理解新中國極力反對的傳統文化遺產。革命與進化相互牽涉，所要探討的並非中國本身，而是全人類的中國，尤其是階級的中國。特別的是，中國革命不畏幾世紀以來象形文字的教誨而給予自己任務，掙脫讓勞動的中國群眾無法接近的象形文字束縛，並向我們學習拉丁字母的文化與教育制度，以既簡單又最有效的方法，將新教育帶回中國。眾所周知，中國書面文字拉丁化乃由我國科學院研究群提供主要方法（若無例外的話）來努力創造而成。他們協助教育中國的勞動群眾，同時也訂立另一個新目標：不像以前那樣藉助於方塊文字，而是以拉丁字母的書面文字來教俄國人學中文<sup>12</sup>。我個人認為，貫徹執行這項教學目標，就各方面來說，都是真正的革命創舉<sup>13</sup>。

<sup>11</sup> 阿列克謝耶夫指的是龍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在莫斯科的中國學生們操著許多方言，龍果夫由此蒐集方言材料，並開創學術先例，闡述武漢相當「獨特的方言」。請參閱：Драгунова Е. Н. и Драгунов А. А. *К латинизации диалект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итая. Диалекты Сянтянь и Сянсян (Хунань)*.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Отд.-ние обществ. наук. VII сер. 1932, 3。很可惜，龍果夫蒐集的山東省各縣之方言材料，至今仍未出版。

<sup>12</sup> 請參閱：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латинизация*. Л., 1932. 以及 Шпринцин А. Г. “Из истории нов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лфавита (1928-1931 гг.)”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1, № 6, с. 126-135。關於阿列克謝耶夫主持的漢字拉丁化小組（Комиссия по латин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以及中國內部的拉丁化問題，請參閱：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132-133; 404-405, примеч. 41-43 (сост. В. В. Петровым)。這裏必須補充，蘇聯（遠東地區）曾在三〇年代為廣大的中國勞工發行過以拉丁化漢字印刷的報紙、宣傳手冊和中小學課本。儘管中國內部不止一次地討論過漢字轉譯為拉丁字母的問題，至今漢字的方塊文字仍原封不動。

<sup>13</sup> 其中我認為最需要拉丁化的是列寧的文章，他的文章仍藏於方塊文字，不為大眾所知。我特別

但在繼續其他論述之前，我要先將注意力轉向我們研究工作的進度，雖然這樣會有點偏離敘述的脈絡。中國革命讓學術不再只被熱衷於書籍和韻文創作的士大夫所壟斷，而是發行了通俗雜誌，讓已簡化且幾乎改為拼音的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廣為流傳。中國和歐洲如果能在更早之前就開始平和地研究任何一本中國古籍，並相信學術現實不會遠離他們，那麼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樣十足的信心了。中國的學術期刊種類繁多且期數也多，我們應該要跟上，所以不能不慌不忙地一天只讀個幾頁，而要隨時關注時事，不因自己的過失而錯漏。蘇聯的漢學家應該精通中文中豐富的知識，不能像以前一樣花整整十年來學習入門，我們必須培養出活躍且迅速的漢學活動家，這是當前最需要達成的任務。

可想而知，漢學家的新研究方法加快了研究中國的腳步，也提升了中文及中國文化的教學進度。如前所述，舊中國不再是年輕人感興趣的獨立議題，甚至不再是能解釋一切的基礎，也不再是普通教育的最低限度。它漸漸只被當作解釋現況時的參考資料，僅是如此而已。相反地，新中國（或說是當代中國）則是唯一的研究主題，因此研究方向從被舊中國文化制約的古老象形文字，轉向研究拼音文字和新文學。目前還仍不複雜的大學課程增加了好幾倍，提出了所有新主題和新研究動機，多是探討中國革命與階級鬥爭這類主流題目。中國的經濟狀況備受關注，而漢學也根基於其上。先前漢學根基於古籍，而現在以中國經濟來解釋先前欲以古籍闡釋的事情。簡言之，情況已很明朗：因為我們已經從十月革命中學到如何接近中國，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取代了舊中國重典籍的文化，符合普遍的局勢及價值觀。

最後，蘇維埃中國<sup>14</sup>的全新議題為現代漢學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任務，因為漢學已步上平等的道路來研究中國現況。兩個、甚至多個民族的相互理解，使原本毫無聯繫的民族現在能用相同的步調和秩序前進著，就像蘇聯的所有民族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就不會再出現雙方因陌生而相互戒備的狀況了。

不過，中國內部存在的「舊中有新、新中有舊」之基本問題，賦予了很大的研究空間，甚至大於舊俄羅斯與新蘇聯間關係的研究。即使沒有可借鑑的對象，中國

---

寫過關於列寧文章中譯本〈列寧選集〉(Ленин сюань цзи)的文章，收錄於阿列克謝耶夫著《中國文學論文選集》(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М., 1978, с. 527-531)的〈列寧的中譯本〉(В. И. Ленин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

<sup>14</sup> 有一種看法認為，所謂的蘇維埃地區在中國，乃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27-1936)在共產黨督導下所成立的。

並沒有比較衰弱，反而充滿生機與平等。不再有所謂的「中國風」和「中國文字」，而只有能傳達和解釋普世價值的語言。於是，將語言當作文化內涵的觀念，會被輕易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學校普遍採用的形式語言，不斷將事情簡化，教學效率將會比十月革命前還要快上許多。簡而言之，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也就是不再是不關心周圍鄰國（包括我們俄羅斯在內）的國家。雖然中國那種自命不凡的態度始終沒有被嘲笑過，但現在看來著實可笑。

然而，這些理解中國現況的簡化途徑確實讓一些不嚴謹的學者鬆懈了，尤其是一些投機分子。他們急於利用時機，好讓自己能逃避在歷史文化和語言層面上的所有責任，想趁機在學界飛黃騰達。而對嚴謹的蘇聯漢學家來說，已由先驗 (a priori) 現實決定的「兩個中國」問題很難在學術中得到解答，因為關於這問題的戳記 (штамп) 還不夠多，還沒有多到可以不用為其擔心。歐化中國和古老中國至今仍存在，中國文本中常看到以象形文字來拼寫英語，就像是在讀漢學家從中文翻過來的譯本時，還不如直接讀外來且偽裝不成的象形文字。歐洲文化並未完全融入中國，甚至侵入的方向也不是很明顯。因此，要投身研究中文和中國文學之前，似乎必須具備紮實的歐洲文化基礎知識，並以此先去涉獵中國當代文本，因為歐洲文化在當代中國文本中越來越常出現，而文本甚至可能反映了作者在某處讀過的翻譯資料，或者更多是直接出自原文。全面瞭解歐洲文化是中國年輕知識分子努力追求的目標，卻並非所有漢學家都能達到最基礎的水準。

變革者不管象形文字的實際且特別的存在，大喊完全破壞舊中國根基的口號，但這些口號卻缺乏任何的學術證據，因為變革不該只改變外在形式，而應該改變內容，放棄形式上已經不需要、且將來也用不著的內容，唯有如此，才能確切地擺脫舊的進化過程。

終於，「漢學家」這個概念無限擴張到理解範圍之外，也終於走入大家能夠理解且承認的準則裏。半調子的學者和印刷機（也就是各個專業領域都涉及一點的人）應該要躲在嚴謹的蘇聯學界之後，因為學界有權要求我們更努力地研究，而不是談論自己的成就、寫出我們好不容易才瞭解的那一丁點事。